

他差一步改变历史

纳粹情报局长的阴谋

[英] 理查德·巴塞特 / 著
张孝铎 /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HITLER'S SPY CHIEF:
THE WILHELM CANARIS MYSTERY

他差一步改变历史
纳粹情报局长的阴谋

[英] 理查德·巴塞特 / 著
张孝铎 /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他差一步改变历史：纳粹情报局长的阴谋 / (英)
巴塞特著；张孝铎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6
(历史拼图译丛)
ISBN 978-7-5153-1707-6

I. ①他… II. ①巴… ②张… III. ①卡纳里斯,
W.F. (1887 ~ 1945) — 传记 IV. ① K835.1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3446 号

HITLER'S SPY CHIEF: THE WILHELM CANARIS MYSTERY By
RICHARD BASSETT

Copyright: © 2005 BY RICHARD BASSET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KATE HORDERN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CHINA YOUTH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01-2012-6054

责任编辑：谢肇文
装帧设计：瞿中华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57350420
门市部电话：(010) 57350370
印刷：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1
插页：8
字数：200 千字
版次：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6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 57350337

追念

朱利安、艾伦和尼古拉斯，

这曾是你们的世界。

献给

比阿特丽斯和埃德蒙，

但愿，

这不是你们的世界。

编者的话

威廉·卡纳里斯是书写第三帝国史时绕不过去的人物。他不像古德里安、曼施坦因、邓尼茨、隆美尔等纳粹将领那样为帝国冲锋陷阵，为自己赢得军事史上的大名，以及后人对其战争技艺的崇敬；恰恰相反，卡纳里斯所做的，就是要让以上名将的赫赫战功溃于蚁穴。

早在一战时，卡纳里斯已崭露头角，他精熟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海战中单刀赴会与英方交涉，并成功化装逃脱；后来又被意大利人抓获，再次遁走；还有一次在被英国间谍盯梢的情况下，他又乘潜艇逃之夭夭。不过，他的能力远不止于此。1935年，卡纳里斯升任第三帝国国防军情报局（Abwehr）局长，希特勒对他寄予厚望：“我想建立一个像英国情报局这样的机构，团结一群人，满腔热情地去战斗。”果然，卡纳里斯上任后招兵买马，蛛网密布，建立起了多达万人的情报网络，触角遍布世界。

卡纳里斯无疑是个爱国者，对于德国的未来，他有独立的判断。他认为希特勒正把德国拖进一场战争浩劫之中，他开始用尽一切办法，拖延战争的开始，缩短战争的进程。但身居纳粹系统高位，他的反抗只能在暗中进行：他始终与纳粹军官反抗组织保

持着距离，但却保护着他们的活动；他的国防军情报局在纳粹的历次侵略中都立下功劳，但却每每与英国暗通款曲，争取和谈。就这样，他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与推翻希特勒之间走着“危险的钢丝”。他在情报中夸大英军的战斗力，使德国丧失了打击英国的最佳时机；他给佛朗哥通风报信，让他在与希特勒的会谈中占据了信息优势，脱西班牙于战祸，救英国于水火。最终希特勒因为卡纳里斯工作不力而撤销情报局，后来他通英“罪行”东窗事发，卡纳里斯受戮于即将被盟军攻破的福洛森堡。

接替卡纳里斯成为纳粹情报头子的施伦堡在《施伦堡回忆录》中说：元首让卡纳里斯去找叛徒，这简直等于让山羊给你看花园。

读史者常问：如果……那会怎样？如果普林西普没有刺杀斐迪南，那会怎样？如果德国打败了苏联，那会怎样？如果社会主义阵营没有瓦解，那会怎样？这本书也带给我们无数的“如果”，包含着无限可能的遐思：如果英国慎重地考虑了卡纳里斯的和平试探，那会怎样？如果西班牙被希特勒绑架，一同占领了地中海入口，那会怎样？如果苏联间谍金·菲尔比没能截断卡纳里斯和孟希斯的接触，那会怎样？如果那瓶白兰地炸弹如约在空中爆炸了，那又会怎样？

致 谢

写作，是所有创造性追求中最自私的。写作者迷醉在自己的创作迷宫里，亲友和同事则要终日面对一个沉溺写作几乎不可自拔的家伙。因此，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妻子艾玛-路易斯、儿子埃德蒙和女儿比阿特丽斯、我的母亲、岳父岳母，以及不得不忍受“海军上将”差遣的亲戚们。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我的代理人凯特·霍登，没有她不倦的鼓励，这本书不可能成形。

卡纳里斯之谜第一次引起我的兴趣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刚离开新闻业，有幸与朱利安·埃默里、艾伦·黑尔和尼古拉斯·艾略特一起亲密地工作数年。虽然他们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洞见、仁爱与厚谊依然令我受益、感激至今。从许多方面来看，卡纳里斯的故事也是他们面对挑战与抉择的故事。正如本书所展示的，很多时候，他们可不只是跑跑龙套而已。感谢已故的伊桑·贝·汤普塔尼，睿智而善良的他对战时英德情报界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理解。

同样，没有他国友人的支持，本书不可能问世。在西班牙，我欠着布杰姆、皮伯斯和东利·弗利森的人情，正是在他们的马洛卡图书馆里，我偶然发现了国防军情报局的故事；我还要感谢卡门·丰特斯和阿方索·拉·帕拉塔等西班牙外交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葡萄牙，我受到了安东尼·阿尔弗雷和弗朗西斯·贝弗里

奇的热情款待和帮助。

在德国，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有欧洲最丰富的二战档案文献收藏，这里的工作人员曾鼎力相帮。我要特别感谢格罗斯曼女士和鲍克纳先生，他们花了好几个星期，指引我在几英里长的微缩胶片中寻宝。安东·格拉夫·温格斯基、妮娜·布沙特博士、克里斯汀·菲佛博士、克里斯托弗·马丁神父、克劳迪娅·埃勒斯夫人、卡尔-克里斯蒂安·雅克比以及皇后街耐心的同事们也帮助了我，在此一并感谢。感谢克隆贝格的朋友们，尤其要感谢安德里亚斯·冯·埃德曼和加布里埃拉·冯·埃德曼，还有多纳图斯·冯·黑塞，我在他位于克朗伯格的塔楼里完成了本书的部分内容。当然，我还要感谢弗雷德里西斯霍夫联邦军事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卡纳里斯的家人。

我对已故的埃里希·维米尔充满感激，他逃往同盟国对国防军情报局及卡纳里斯的命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感谢他与我分享他的回忆与思考，为我描绘出1943年初那惊心动魄的故事。柏林的加比·冯·舍芬和丹尼尔·冯·舍芬为我提供了大量帮助。几天茫然无果的搜寻之后，我在迪穆特·斯特林的帮助下，终于辨认出卡纳里斯在金湖的居所。感谢大卫·布劳和安德鲁·克莱格·利特勒提出宝贵建议，特别是关于1940年芬兰战役的细节。

感谢身在意大利的露西安娜·弗拉萨蒂，她也许是布拉格认识海德里希的唯一在世者*。感谢蒂兹亚娜·弗莱斯科鲍尔迪、弗

／
* 弗拉萨蒂已于2007年去世。——译者注

朗西丝卡·加利、旺达·加富隆斯卡、安东尼·巴内特神父、阿莱西奥·阿提克耶利、皮耶罗·科恩和保罗·鲁米兹。我要向梵蒂冈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唐·文森佐·帕利亚表达谢意。在的里雅斯特，我对戈特弗里德·冯·班菲尔德男爵的真知灼见与和善热心充满感激，一战期间与卡纳里斯同在普拉服役的他如今也已去世。

在萨尔斯堡，我得到了伊丽莎白·瓦尔德多夫和科妮莉亚·梅兰的帮助；帕拉塞尔乌斯书店的莱茵霍尔德·盖亚与杜塞尔多夫的吉尔伯特书店为我提供了大量二手德语资料。在维也纳，我受助于约翰·尼克尔森、夏洛特·沙佩里和现已离世的格奥尔格·艾斯勒。在布拉格，玛丽安·斯威达、丽莎·斯威达、丹尼尔·史贝卡和维多利亚·史贝卡帮助了我。在华沙，我还欠着伊戈尔·维特科夫斯基和他在军事情报部门的朋友的人情。我对米科拉赫·拉齐维尔和伊娃·斯杜兹钦斯卡同样心怀感激。

在伦敦，我要感谢基尤的两位研究员——埃尔维斯·比弗列夫和贝图拉·戴斯塔尼的辛勤工作。英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文件属于皇家版权，经由英国文化局的许可方得以复制。在智利，克里斯平·萨德勒慷慨地与我分享了福克兰群岛之战后，亲历者讲述“德累斯顿”号最终结局的宝贵资料。

感谢卡纳里斯的秘书之一英嘉·哈格，以及弗朗西斯卡·斯库恩斯、安德鲁·金逊、吉娜·托马斯、约阿希姆·冯·哈拉兹、贾尔斯·麦克多诺。还有德斯蒙德·麦卡锡和蒂娜·麦卡锡，他们位于威福顿的静谧的图书馆对本书的筹备而言不可或

缺。玛丽·詹姆斯和乔尼·詹姆斯的奥尔德堡书店里的图书他处难寻，伦敦图书馆的藏品也无与伦比。已故的贾斯汀·克劳福对于20世纪历史重要而晦涩的注脚怀有的兴趣与热情，始终激励着我，他的见识与陪伴令我受益。

感谢伊恩·科尔文、尼尔·阿彻森、大卫·史麦利、吉尔·黑尔、伊丽莎白·艾略特、佩内洛普·戴、利奥·埃默里、诺曼·斯通教授、马克·阿尔蒙德、约翰·史蒂文斯、卡特琳娜·凯尔顿和布兰登·唐纳利。感谢战争博物馆，允许我接触到妻子的表亲、皇家海军上校乔布里奇的日记，战前他曾在柏林出任海军武官。过去的同事们，特别是克利福德·比尔、尼古拉斯·库克和克里斯·阿隆，为我提供了大量帮助。

我在威尔特郡完成了本书的大部分写作，感谢查尔斯·埃尔维尔、罗宾·卡内基、艾奥娜·卡内基、达芙妮·拉姆等邻居们，特别是戈登·艾瑟林顿·史密斯——战前英国驻柏林大使馆唯一还在世的高层人员。克莱尔·托马斯和朱利安·托马斯、詹姆斯·朗德尔和萨拉·朗德尔、露丝玛丽·麦克唐纳、乔·坎特、迈克尔·狄龙和汉丽埃塔·狄龙，让我的写作得以延续，在此感谢。

我在美国得到了克兰·蒙哥马利三世的协助，并有幸分享了现已离世的泰德·沙克利对情报问题和历史趋势的见解。

最后，我要感谢情报机构的所有成员，提及他们的姓名会招人怨尤，但正是他们，在卡纳里斯也定会认同的兄弟情谊之下，支持并指引着这项谦卑的事业。

序 言

想为卡纳里斯作传的人几乎找不出比他更难描摹的对象了。尽管安德烈·布里索和海因茨·赫内等人为他写下了精彩的传记，但这位不知何故竟助英国取胜的德国海军上将，在其死后半个世纪以来留给后人的谜团却有增无减。纵然战后对他的评析不止千言万语，卡纳里斯与英国神秘莫测的关系依然为二战史的每个篇章都投下了暗影。因此，虽然心怀一丝胆怯，我还是颤抖着将手中的火把照向了曾为众人探寻，如今却幽暗阴森的国防军情报局地窖。

挖掘秘密行动资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与某个机构某人的交情并无助益，依然处于《公务员保密法》保护之下的事件尚未解禁，显然也无从讨论。有些部门的人员虽然能就其他话题滔滔不绝，但对我穷追不舍的询问和旁敲侧击的刺探只给予了庄重而友善的沉默。无论知名人物还是默默无闻的小卒，都证明了他们对诺言的忠诚。如果研究英国二战期间绝密情报行动的人能学到重大的一课，那便是不可能说服这些机构的人员背弃誓言。对相信没有高效而忠诚的情报机构，国家就没有未来可言的人来说，这确实令人放心不少。

不过，能够与参与刘易斯·纳米尔所谓的当代史“事务”的人们交往，始终是一件乐事。此外，正如他所指出，重大秘密总

是会见诸文字，只要你知道要寻找什么，发现它们就并不困难。现有资料对得出令人信服的推理与精妙的演绎功不可没。然而，公开的文献常错误频出，未公开出版的档案又不时自相矛盾。

为了说明这一点，纳米讲了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的一个小故事。从里维埃拉归来的柯南·道尔从巴黎里昂车站乘出租车前往巴黎北站。出租车司机为感谢他慷慨的小费便说：“真是太感谢您了，柯南·道尔爵士。”当时最伟大的侦探小说家不觉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司机答道：“报纸上说您取道马赛从戛纳过来，我看您的发式是戛纳的风格，靴子上还沾着马赛的泥巴呢。”

“你只靠这些就把我认出来了？”困惑不解的作家问道。

“当然不是，”司机又开口了，“行李牌上写着您的大名哪。”

关注卡纳里斯和英国情报部门中与其地位相当的对手斯图尔特·孟希斯爵士的人，同样有大量资料可以参考。毫无疑问，在丘吉尔的默许下，卡纳里斯和孟希斯为实现英德之间的谅解通力合作，本可在1943年结束战争。

至于两人是否见过面，读者会得出自己的判断。记载此类会面的档案当然不会出现在公众视野，但孟希斯战后再三向记者声称两人从未谋面，似乎与间接证据矛盾。

掌权者的决策标准极少有浅而易见的，战争时期更是如此，尽管这些决策是在现代民主的光芒照耀下做出的。不过，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在我看来，无论见闻何等广博，我这一代人这么做都不恰当——对做出重大决策、改变二战进程的政治家与国

家公仆妄下断语。正如利奥·埃默里所说，只有具备处理重大事件的实践经验，才能对公众人物的行为做出客观评判。而在谍报圈，面对更多混乱迥异的选择，对于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来说，其情势与抉择自然是难以理解的。

卡纳里斯的故事将当权者在20世纪的危难时刻所面临的选择展露无遗。是抓住唾手可得的时机，提前两年结束战争，从而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还是按1945年战胜国苦心拟就的均势计划维持半个世纪和平，尽管中东欧国家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二者也只待读者去权衡了。

卡纳里斯在1943年的失败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德国在20世纪经历了彻底的毁灭，但它在21世纪再度崛起，在国际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德国已成为基督教民主国家，支持合作与共识，拥护与纳粹政权信条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念。纵然有瑕疵，联邦共和制依然被证明是欧洲两代人得以享受和平的基石。

没有1943年至1945年间的灭顶之灾，同样很有可能实现相同的转变。但看看激烈反抗战后德国新政权的家庭绝望而痛苦的经历，以及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重新融入社会的艰辛，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纳粹主义的病毒与其裹挟的强烈仇恨，只有在最全面的免疫计划之下方无生存之处。

也许，在卡纳里斯眼里，21世纪的德国或多或少已成为凯恩斯口中“浸润于西方文明”的德国，一个令海军上将卡纳里斯与共谋者为之奋斗、以死相许的德国。

平装本序言

写一本对二战的某些基本假设提出挑战的书，势必要冒极大的风险，我对于卡纳里斯的评说自然也会引发部分书评人的不同意见。

正因如此，收到国防军情报局见证者和战时德国幸存者满怀同情地回忆这位海军上将的来信，总令我备感欣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本身就是卡纳里斯甘愿冒失去职位之险也要出手救人的真实而有力的证据。

斯蒂芬·海登博士在写给我的信中追忆了卡纳里斯探访他父亲的情景。卡纳里斯当时居住在柏林的策伦多夫区，海登的父亲是那里的教区牧师。将军笔挺光鲜的制服，随身佩戴的海军“匕首”和黑色镶边帽，给海登一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海登博士在信里说：

“至少有四次，将军帮助我父亲逃离了险境。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是可怕的‘水晶之夜’*。我的父母听了广播，震惊而无助，将发生的一切告诉我们，把我们送到了犹太儿

／
* 水晶之夜，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党员与党队袭击德国全境的犹太人的事件，被视为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译者注

科医生那里。礼拜天，我父亲做了一次这样的布道：

“我们手足同胞的犹太教堂被蓄谋焚毁，这是多么可怕的预兆！难逃的厄运即将降临于我们的德国，这宗教改革的发源地。”

就在这时，我们的管家看见5个人溜出了教堂。其中一个揭发了我父亲，第二天他就被带到了警察局。面对严词质问，父亲勇敢地叫他们去问卡纳里斯，将军就是郊区的居民，干吗不听听他怎么说。警察们果真去找了将军，他淡淡地答道：‘海登牧师绝不会说这种话。’我父亲面临的所有指控随之一笔勾销。”

海登博士接着写道：

“40年代初，我们策伦多夫区13名娶了非犹太女子的犹太男人被发配到集中营。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她们知道丈夫的下落，于是向我父亲求助。父亲拟了一个名单，交给卡纳里斯将军。在卡纳里斯和下属的努力之下，13人全部获释。父亲告诉我们，将军设法把他们运上已经关闭的火车厢，他们将在弗朗哥的庇护之下，进入马德里。卡纳里斯动用关系，安排这13人住进马德里的私人住宅，直到其中一些人飞往英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加入了英国军队。”

作家多萝西·弗利斯的朋友也描述了相似的情景，这一趟拯救生命的列车是1942年从柏林驶往瑞士巴塞尔的：

14名乘客的安全岌岌可危，有一位女士就要被送进集中营了。他们当中有两名犹太混血女孩，是卡纳里斯的女儿布里吉特的同学。经过一番复杂的运作，卡纳里斯说服了盖世太保，他们都是纳粹德国一个重要的线人小组的成员*。

这些并不是特例。“在卡纳里斯的鼓励下，很多犹太人和混血的犹太人穿上了军装，拿到了军事情报机构的证件。”**另一个亲历者写道。

我也注意到温妮弗雷德·梅耶在她的著作《7号行动》中提及的“阿奎莱尔行动”：“经过冗长烦琐的协商，6列载着约500名犹太人的火车取道比利时及荷兰，进入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人“德国要安插在拉丁美洲的间谍”。

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卡纳里斯后裔的几位密友托他人转寄给我的信：“我想，没有一个作家——甚至没有一个德国人——比你更认同卡纳里斯以及他在国防军情报局和军事抵抗中的作用。”***

依然相信卡纳里斯是“阴险的神秘人物”的读者，看罢这些亲证者的评论及本书即将展开的内容，或将不再怀疑海军上将自加入战斗就从未放弃过的信念。

2010年5月于汉普郡

／
* 多萝西·佛利斯：《救援史》（Geschichte einer Rettung），节选内容于2009年4月14日寄给作者。

** S.H.于2008年11月3日的来信。

*** H.S.于2009年9月18日的来信。

前言

大胆之极……不幸之至。

——斯图尔特·孟希斯爵士谈卡纳里斯^[1]

“佐尔蒂科中士！”看守咆哮着，盖世太保总部地窖里，暗室的铁门应声而启。犯人如临大敌，警觉地站起身。水桶和扫帚咣当一声摔在地上。盖世太保身前几步，一个身着灰色西装，蓬头垢面、白发皤然的男人拖着脚步走进牢房。佐尔蒂科目光一闪——他认识来人。从1940年开始，他与这个老人在一起工作了四年。威廉·卡纳里斯再也不是那个执掌着希特勒情报机关、威望鼎盛的海军上将了。真是相逢难识啊。

“佐尔蒂科中士，”看守的命令传来，“叫你的狱友把这儿打扫干净。”牢门砰然关闭，两人颓然跪倒在地。^[2]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失败一事并未直接牵出卡纳里斯，只不过是重启了业已存在的怀疑——他早已被视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了，接踵而至的便是逮捕和审讯。此时是1944年夏末，卡纳里斯在诉讼中获得了一次短暂的喘息。他知道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以致管控严格的“人民法庭”甚至连他受审的消息都没有公布。盖世太保也欲将卡纳里斯与“七月阴谋”扯上关系，却始终一无所获。不过，在和老同事佐尔蒂科谈话时，他或许会吐露一二。相识四年，卡纳里斯始终将佐尔蒂科视作“天生的间谍”，对他欣赏有加。两人交谈时，牢房中埋下的三枚窃